

● 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

孩子需求论

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

● ●
叶文振 著

● ●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
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

孩子需求论

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

叶文振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孩子需求论

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

叶文振 著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锦佳装潢印刷发展公司印制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318 000

版 次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500

书 号 ISBN7-309-02065-0/C·37

定 价 16.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总 序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并在不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现代化建设事业一步步在开创着新局面。生产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综合国力的极大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显著提高,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但是,这些成就和成绩的取得,与我们面临的到 21 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相比,还很有限,要走的路还很长。

我们正面临着三个根本性转变:第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第二,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第三,从不发达、不完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向比较发达、比较完善和合格的社会主义转变。在体制转轨、发展转型和制度完善“三位一体”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我们将会遇到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这既是旷古未有的巨大挑战,又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美国弗里德曼教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谁能把中国的情况说清楚,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处于伟大变革时代的中国经济学人,理应承担起落在我们肩上的历史重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文章和经济著作空前繁荣。数一数当前我国出版的书籍和报刊的种类和数量,无疑首推经济领域。需求引起供给,这是正常现象、好现象。但其中确实也有相当一部分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等缺乏价值的作品。出版社的过度竞争和不正之风,著作人的目标短期化,是形成这类

局面的重要原因。而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研究成果,不仅要体现在数量方面,更要体现在质量方面。一篇优秀文章,一部高质量的精品,其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远胜几十篇、几十部甚至几百部平庸之作。精品力作才是科学技术水平的标志。有鉴于此,复旦大学出版社拟以相对集中且有规模优势的学术群体为依托,欢迎国内外经济学博士和博士后的参与和赐稿,组织好时代性、理论性和应用性强的选题,出版融专业性、学术性和前沿性于一体的《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专业性是指丛书涵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及其二级学科为范围;学术性表现为资料和观点的引用应准确可靠并注明出处,研究工具和方法科学先进,实证分析基础上引出规范,观点鲜明,内容充实,论证严密;前沿性应表现在研究的问题属该学科中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学术界还缺乏深入研究甚至尚未研究过的,或者能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和资料进行论证并提出新观点、新结论的,总之前沿性要求有开拓性和创造性。为保证丛书预定的目标,出版社将采用国际通行的出版机制,对每部书稿实行两名以上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严格把关,杜绝伪劣。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济研究工作的指导。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难免带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但就其基本内容而言,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反映,值得我们借鉴。借鉴并不等于照搬,关键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从中引出合乎实际能解决问题的结论。在这一过程中运用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原理、分析工具和方法,以符合国际规范,是必要的。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献,或是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名著,都应该结合实际重新学习和再认识,实事求是地总结和传承借鉴,其根本目的则在于发展和创造。

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加快改革开放,推进建设发展,逐

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合格社会主义。但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落后的二元经济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我们去创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他的经济理论的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框框,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打开了通向胜利的道路,展现出经济学发展的无限广阔前景。这里,既需要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同样需要各具体经济领域应用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它们共同构成有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大厦。

经济学优秀成果的产生,要经历一个艰辛的学习、思想、探索、研究过程。希望这套《经济学博士后、博士论丛》的每一本,都能以真诚的态度,解放的思想,求实的作风,开拓的精神,从改革开放和建设实践中提出新问题,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在有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中贡献一份力量。

伍柏麟

1996年国庆于复旦大学

序

这是一部为人父母者都会关心但未必都有兴趣阅读的著作。都会关心,是因为著作的主题是和每个父母都有关系的关于生养孩子的成本和效用问题;未必都有兴趣阅读,是因为这是一部“纯学术”的研究专著。

这是厦门大学叶文振博士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研究成果所形成的一部专著,主题如书名所昭示:《孩子需求论: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以下简称《孩子需求论》)。

作为一个从事同一职业和专业的先读者,我阅读这部著作感到很亲切,也很振奋。这倒不是因为作者在每章开篇都有一段点睛之语,形式上比较新颖,而是因为作为一部学术研究的专著,作者做得十分职业化、规范化。本来,这一点也许不应该特意提出来,对于以学术研究为职业的研究者来说,这应该是起码的职业资格,缺少这种资格的人是不应该进入这一领域的。然而,把这一问题特意提出来仍然是有意义的。一则,虽然学术规范化问题在近年已有很大的改观,学者们越来越注意研究和成果的规范化问题,但是不规范的研究和成果还是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二则,这也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不规范问题已成为影响学术研究及其成果质量的普遍性问题。这一问题当然是由未已久而非现在才有,而且也早已有人指出,如提出问题不介绍前人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观点不注明出处等,这一问题甚至被上升为学风问题和职业道德问题。

在这种情势下,读到十分职业化、规范化的著作总是让人感到振奋。而叶著可以说正是这样一部让人感到振奋的学术著作。在

这部著作中,作者在导论之后用整整两章的篇幅介绍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西方学者的和中国学者的。不仅如此,在旁征博引众家学说的同时,作者对每一个引用的成果都作了规范化的注释。可以说,作者在形成成果过程中是十分严谨和规范的。

如果说形式上的规范尚容易做到的话,那么,内容上的规范就不那么容易做到了。这不仅需要有职业道德和职业习惯,还要有严格的学术研究训练。在经常看到的许多研究中,不难发现,研究内容上的不规范比诸形式上的不规范更严重。这一点上,作者在他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他指出:“……似乎每一篇论文都是对某一个问题的最新研究,看不出理论界对这个人口问题研究的历史进程和学术现状,缺乏学术研究那种特有的前后连接又有发展的态势。”这是研究内容上的不规范的一个方面,即漠视或无视学术研究的传统。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方面的不规范做法,如:资料分析不交代资料质量,调研报告不说明抽样方法,历史分析不考证史料真伪,理论研究不追溯渊源,等等。

在人口学界,和其他社会科学界一样,重建学术规范问题也是人口学者多年来一直呼吁的一个问题。就现状而言,学术失范问题已有一定改观。在人口学研究恢复初期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除了一部分老学者保留着规范的学术研究传统之外,许多研究论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着学术失范问题。举例而言,引用参考文献问题,不仅一般的学者没有这种意识,大多数刊物也默认甚至鼓励这种失范,如果论文附有参考文献,编辑要么全部删去,要么处理为“参考文献从略”。这种现象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开始引起关注和重视。与社会科学界讨论学术规范化问题几乎同时,许多刊物也开始做学术规范化的工作。所以,90年代以来,形式上的学术规范化逐渐得以实现,而内容上的学术规范化也开始在一些研究中出现,但尚不普遍。

或许多年来受严格的学术研究训练和国际学术界熏陶的缘

故,叶文振博士对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的研究,不论是的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中规中矩的,做得相当的规范化,这是十分可贵的,也是十分可喜的。

在人口学研究恢复的初期,人口学界的先驱者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知识积累,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理论解释和论证;另一方面组织力量翻译国外人口学研究成果。这样,体现在研究论文上,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论文是引用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而另一部分则是应用西方人口学方法和人口分析技术来分析中国的人口现象。然而,直接引用国际人口学界研究成果的论文并不多见。真正打破国别界限,以国际学术界的惯例展开并试图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同步的人口研究,主要出现在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

就具体研究领域而言,生育率变动从人口学研究恢复以来就一直是人口学界的热点研究课题,至今已形成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涉及面十分广泛,从生育率变动本身相关的中国人口转变模式研究到决定中国生育率变动的因素分析,从生育率变动及其决定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国际比较到中国生育率变动及其决定的调查分析,几乎所有有关生育率变动的领域均有研究者涉足,而且,在某些方面,研究已深入到十分具体的领域,比如,对于中国生育率变动决定因素的分析,不仅有宏观上的因素分析,形成各种因素决定论观点,也有微观上的具体分析,提出各种假设理论,还有关于某一方面因素的具体深入的专题研究,形成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与生育率变动关系的理论观点。也许可以说,生育率研究是中国人口学界研究比较深入、成果比较丰富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域之一。

在这一参照系之下来评价叶著的《孩子需求论》,我们不难发现这样几个特别之处:

1. 选题具体明确而富于现实性。与已有的许多研究专为生

育率分析而设不同,叶著的选题是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这样,对于作者来说,既可以利用和借鉴前人关于生育率分析的研究成果,又可以在此基础上拓展有关孩子成本和效用的具体研究领域。虽然关于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容易让人联想到生育率变动的经济学分析,如西方人口经济学中莱宾斯坦(H. Leibenstein)、贝克尔(G. S. Becker)、伊斯特林(R. A. Easterlin)等人的研究,但是叶著并非一部纯粹的经济学分析著作,而是一部跨学科的研究著作,这既与成本—效用分析已为其他学科所接受并发展有关,也与作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关。这其实也正是叶著区别于国内已有研究成果的一个方面。就具体问题的研究而言,关于中国孩子的成本问题的研究早在人口学研究恢复初期就已开始,如孙竞新、刘铮、林富德等人早在1979年就对中国劳动力培养费用问题进行研究,此后,先后又有多个研究课题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只是,多数研究属于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专题性研究或对某一理论框架的应用性研究,而叶著则是这一领域问题的一项综合性研究,在同一领域中已经居于前沿地位。

2. 细致全面的文献研究。与前述的规范化问题相联系,一般的课题研究最薄弱之处不在于其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而在于作为其基础的文献研究。多数研究的文献研究部分仅仅是列举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作为问题提出的依据,对于文献本身及其来龙去脉鲜有具体的分析。如果说国外部分的文献研究薄弱可能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如资料可得性等),那么,国内部分的文献研究薄弱就不能归之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与治学的态度和研究的风气有关。在叶著中我们可以看到可喜的不同,即基础文献研究十分扎实,在全书中有整整两章的篇幅专门用于讨论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此重视基础文献研究在国内人口学研究中是不多见的。如果说,这是由于作者多年在国外学习和研究从而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十分熟谙,因而能够驾轻就熟地分析各种流派

的理论,那么,作者对中国文献的熟知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他对这一领域的文献收集之全是一些综论性论文也难以望其项背的。而对西方三个学派的分析,也已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内学者所了解的范围,在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文献的最全面也最细致的分析,而这也为作者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人口问题无疑是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但并不排斥其他学科对人口问题的研究,不仅如此,由于人口问题的“总体性”特征(“人口是包含许多关系和规定的丰富的总体”),历来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甚至,人口学的形成本身也是多学科交融的结果。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人口学形成后,也就有了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有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并以此区别于其他学科对人口问题的研究。问题在于,人口学如果因此而断绝与其他学科的交流,那么,就可能限制自身的发展,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也会因受到限制而难以深入。有关生育率变动及其决定因素的研究业已形成诸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体现在诸多学科领域中,正如叶著所归纳的,大致而言,可分别从三个学科加以考察,即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人口学的研究纳入社会学的学科领域),而每一学科又有着不同的理论流派。从叶著第二章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在不同学科领域中,各种理论流派的形成和创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其他学科的批判和借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多学科交流的结果。在叶著中,作者对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的研究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避免了单一学科研究的拘囿,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人口学研究中没有跨学科研究,也不意味着中国人口学没有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事实上,近年来发表的不少优秀成果就是跨学科研究的结果,即使是在叶著研究的领域中也有一些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如西安交通大学人口所蒋正华1987年主持的一个研究课题就采用了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只是,相形之

下,叶著的跨学科研究涉及领域更广泛,除了经济学、社会学(包括人口学)之外,还涉及心理学领域,并且,充分利用和借鉴了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这使叶著的研究更为扎实,也更为丰富。

4. 规范的实证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需求论》一书可看作一篇长篇的调研报告。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厦门的个案研究,对中国的孩子成本和效用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而这种探讨,作者采用了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所谓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不仅在于作者在形式上严格按照规范的研究程序开展其研究工作,这一程序可归结为:基础文献研究——研究框架和假设——资料来源和方法——资料分析和比较——新的发现和讨论——结论。应该说,这种形式上的规范程序是必要的,没有这种形式上的规范程序就不可能形成规范的研究文本。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规范。比如,基础文献研究是否全面细致,研究框架是否合适,理论假设是否有依据,资料来源是否可靠,研究方法是否可行,逻辑推理是否科学,如此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用相当多的篇幅来讨论研究的理论框架、研究假设、资料收集和研究方法,也就不是多余的,而是十分必要的,进一步说,作者在这一部分提出的关于孩子成本和效用的界定,关于孩子需求的三大内容、三个层次和三个阶段,关于抽样调查方法的讨论,关于分析变量的选择和方法的使用,等等,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在具体的研究中,作者又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分别采用描述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单因素影响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等方法开展研究,将定性的方法和定量的方法结合起来,逻辑思路十分清晰,推理过程十分严密,因而,所得出的结论也就经得起推敲,从而具有科学性;所提出的政策意见和对策思路也就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孩子需求论》一书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对孩子的需求是怎样的?需求什么样的孩子?需求多少?在要不要孩子、要多少

孩子和要什么样的孩子等问题上,中国人是如何考虑的?所涉及的因素有哪些?如何解释中国人对待孩子需求问题上的种种现象?……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中国人如何生育和为什么生育?更进一步说,就是人类如何生育和为什么生育?

关于人类如何生育和为什么生育的问题,在远古时代,这是一个无须回答也无法回答的问题,更是人类自身所无法决定的问题。生育是天赋的权利,要不要生育、什么时候生育和生育多少等问题是无须多加考虑的。到古希腊时代,虽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国家(城邦)的角度设想过适度人口规模问题,并设想了这不到适度人口规模的种种生育对策。但嗣后的许多思想家并没有因此而研究生育问题,相反地,对柏拉图的诸如溺婴等做法还有不同看法。之所以对生育问题缺少专门的研究,与当时的人口状况是分不开的。远古时代的人口增长无疑是十分缓慢的,甚至还时时受人口负增长的威胁。进入农业社会以后人口增长有所加快,但仍是十分缓慢的。人类人口的较快增长主要是在近代以来的欧洲。当时由于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使欧洲人口死亡率逐渐下降,人口增长不断加快。不断加快的人口增长对当时的欧洲社会形成了持续增加的人口压力。在这种情势下,马尔萨斯(T.R. Malthus)在1798年发表了他著名的《人口论》,并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巨大反响。在这部著作中,马尔萨斯探讨了人口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种种影响。作为一种对策,马尔萨斯提出了抑制人口增长的主张,其中,他所谓的“道德的抑制”正是针对生育问题而设,即通过抑制生育来抑制人口增长。

正是马尔萨斯导先河的人口研究,使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开始关注和研究与生育有关的各种问题,包括要不要生育、生育多少和为什么生育等问题,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育理论。这些理论大致可分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两类。

宏观生育理论在于探讨生育率变动的一般规律。早期的研究

将生育率变动和死亡率变动联系起来,探讨在历史过程中两者相对变动的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规律,如美国学者汤普森(W. S. Thompson)的人口转变地区阶段论(1929)、法国学者兰德里(A. Landry)的人口转变历史序列论(1934)。与描述性的人口转变特征研究相联系的是不同人口转变阶段的各种解释性研究。这种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学者诺特斯坦(F. W. Notestein)、布莱克(C. P. Blacker)的研究为开端,人口转变问题及与之相应的生育率转变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并形成不断丰富的人口转变理论(The Theorie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生育率转变问题,作为人口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也是人口转变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是,相比较而言,所形成的宏观生育理论的解释力要弱于基于个人和家庭之上的微观生育理论。

微观生育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口转变研究的结果或延伸,但有其相对独立性。社会学对生育率变动的研究,大多与人口转变研究相联系,如赫茨勒(J. H. Hertzler)的现代化理论,戴维(K. Davis)的多方面反应理论(The Theory of the Multiphasic Response),弗里德曼(F. Freedman)等人的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ies)和考德威尔(J. C. Caldwell)等人的制度研究(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包括财富流动理论、性别角色假说、家庭合同理论等)。经济学对生育率变动的研究则不同,主要不是人口转变研究的延伸,而是经济学家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关注和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被应用于人类行为。比如,莱宾斯坦(H. Leibenstein)在1957年发表的《经济落后与经济发展》一书中就是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过程中探讨经济发展与生育率变动的关系,而贝克尔(G. Becker)在1960年发表的“生育率的经济分析”论文中则是试图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生育问题。正是莱宾斯坦和贝克尔开创的生育率经济分析,使成本和效用的分析框架被应用于生育率变动分析,形成孩子需求理论。生育率经济分析的成果被社会心理学家所借鉴,形成了

孩子价值研究(The VOC Studies)、决策理论(The Theories of Decision-making)、价值期望理论(The Value Expectancy Theory)和社会动机模式(The Social-motivational Model)等。

中国人口学者在人口学研究恢复之后用力最多的无疑是如何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而控制人口增长问题的关键是控制生育率,因此,如何促使生育率转变是当代中国人口转变的核心问题。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中国人口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包括中国人口转变模式的研究和中国生育率变动决定因素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不乏应用上述种种西方生育理论的分析框架来实证研究中国的生育率变动问题,如对影响中国生育率变动的决定因素的相关分析,中国生育率变动的成本和效用分析,生育与经济、生育与社会、生育与文化乃至生育与心理等专题研究。就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分析而言,早在1979年就有关于劳动力培养费用的研究,此后,又有多个课题研究这一问题,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和北京经济学院人口所于80年代中后期对劳动力培养费用问题的再研究,西安交通大学人口所于80年代后期对中国孩子价值和孩子需求的综合性研究,以及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相关研究。

问题在于,作为已有相当研究基础的孩子成本和效用分析领域来说,《孩子需求论》一书是否有所突破和创新?我以为,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在这一领域里,虽然已有不少成果和相当的研究基础,但是,这些研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对孩子的经济成本探讨得多,对孩子的其他成本,特别是对孩子的效用相对研究得少;对孩子成本效用和孩子需求分开探讨得多,但把两者联系起来研究得少;对孩子价值和孩子需求描述分析或定性分析得多,但对它们定量分析或解释分析得少”。而作者的研究正是试图弥补这些研究的缺陷和不足。从全书的研究来看,我认为,作者达到了其研究目标,并有突破和创新。举例而言,表现在:

1. 对孩子的成本和效用分析,多数的研究更注重孩子的直接成本和直接效用的分析,而对于孩子的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和间接效用则很少估计和分析。而这又与非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效益的度量困难有关。作者在其研究中,不仅充分考虑了孩子的非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效益问题,而且建立了一个多元的度量系统来对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进行估计和分析。这对前人的研究无疑是一次超越和突破。

2.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作者提出的理论解释模型是对前人研究的一次综合,更具有理论张力和解释力。比如,关于孩子需求问题,伊斯特林(R. A. Esterlin)提出了“期望家庭规模”,顾宝昌提出了“三维”需求,穆光宗提出了“多维”需求。而在作者的研究中,孩子的需求是多维的,并根据孩子需求的内涵提出了三三式理论框架,即孩子需求包括三大内容、三个层次和三种发展阶段。

3. 作者在成本和效用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人口控制策略,也颇有新意。作者认为,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人口控制应从生育主体的角度来选择有效的人口控制策略,包括:总量控制法,即提高孩子成本或降低孩子效用;结构控制法,即优化孩子成本结构;替代控制法,即以社会化产品和服务替代孩子效用;间接控制法,即通过提高妇女教育水平、增加妇女就业机会等途径提高妇女生育的机会成本。这些策略既有系统性,又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有益于政府决策时参考。

此外,在具体的研究中,作者还有许多新的发现,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可以说,这是一部系统研究孩子需求问题的力作。

如果要对这部著作加以挑剔的话,那么,可以说,这部著作的长处也正是其短处。如,基础文献研究使这部著作具有厚实的理论基础,但对如此之多的文献进行条分缕析,在阅读时不免有冗长之感。又如,由于条件的限制,作者以中国的中等城市——厦门作为研究的个案,这使课题研究得以深入进行,虽然作者充分利用前

人的成果,将厦门的数据和其他地区的数据加以比较,以寻求普遍性的结论,但是,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全国的情况仍是值得探讨的。这当然也是作为一项课题研究所难以避免的。

和文振兄相识,屈指算来已有15个年头了。那还是1983年,我和复旦大学经济系的同学一起到厦门实习调查,因是全国首届学习人口学的学生,到了厦门,自然得顺访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那时是人口研究室)。那时的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只有黄志贤教授、周无良副教授和留校任教不久的文振兄,号称“三条枪”。机缘凑巧,因为这一顺访,两年后我也来到木棉花红的厦门大学,和文振兄共为人口研究所同事。只是,我报到时,文振兄正整理行装,准备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他这一去就是8年,拿了犹他大学的博士学位,又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博士后,到1994年才回到厦门大学,继续从事他的人口学研究。而此时,我已离开厦门大学多年,自然无缘和他在厦门大学重逢。重逢是在1996年的长沙,就在那里举行的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中国人口论坛准备会上,我获悉他正承担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研究孩子的成本和效用问题。而到了1997年国际人口大会该课题研究已近尾声,将形成专著正式出版。我在祝贺之余嘱他大作面世后见赠一册以拜读。

然而,正式拜读文振兄的大作却并非正式出版的著作,而是一本厚厚的打印稿本。原来,在出版之前他要把课题结题,要我写一个鉴定意见。恰巧,他联系的出版社又是复旦大学出版社,而我作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经济学博士后、博士丛书”编委,也要为该稿写一个审读意见。这样,我也就有机会在该书出版之前先读为快。为写鉴定和审读意见,我认真地阅读了三遍,自觉受益非浅。书稿即将付印前的某一天接到文振兄的电话,约我写一个序言。我心下不禁大为踌躇:文振兄在人口学界属于我的师兄辈,他的著作理当由更有发言权的前辈师长作序,而我与他还有前述关系,既